

柳宗元散文藝術

吳小林



2

责任编辑 李之杰

柳宗元散文艺术

吴小林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 字数：182 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

ISBN 7—203—00871—1
I·36 定价：4.00元

内 容 提 要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773—819），一生坎坷，命途多舛。他著述丰硕，成就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书是从柳宗元的大量著作中撷取散文艺术的这个断面进行专门论述的专著。

《柳宗元散文艺术》分别从柳宗元的散文主张、杂文、传记散文、寓言散文、山水游记、辞赋的艺术特点、柳文艺术风格、结构艺术、语言艺术、柳（宗元）韩（愈）散文比较等十个方面深入论述，标题醒目，分析细致，论证妥贴，富有文采，是一本内容丰富，全面、系统、完整、深入分析柳宗元的散文艺术，可读性较强的文学读物。

本书是文学史进修丛书之一。

目 录

一、文以明道，褒贬讽谕	
——柳宗元的散文主张	(1)
二、议论和诗情的结合	
——杂文的艺术特点	(33)
三、精严生动，传神毕肖	
——传记散文的艺术特点	(60)
四、短小警策，蕴藉隽永	
——寓言散文的艺术特点	(86)
五、文中有画，情景交融	
——山水游记的艺术特点	(110)
六、抒情浓郁，讽刺强烈	
——辞赋的艺术特点	(137)
七、沉郁凝敛，冷峻峭拔	
——柳文的艺术风格	(164)
八、严谨连贯，灵动曲折	
——柳文的结构艺术	(185)
九、峻洁、劲峭、精丽、形象	
——柳文的语言艺术	(206)
十、双峰并峙，各有千秋	
——柳宗元、韩愈散文比较	(228)
后 记	(249)

一、文以明道，褒贬讽谕

——柳宗元的散文主张

(一)

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和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的散文作品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出色成果和他散文革新主张的光辉实践，所以在评述他的散文艺术之前，有必要先对他参加领导古文运动的情况及他的散文主张作一简略介绍。

唐代古文运动是一场提倡古文，改变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革新文体、文风和散文语言的文学斗争。

骈文是秦汉以来在辞赋和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体。它在魏晋时期正式形成，到南北朝大盛，成了文章的正宗。骈文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句法上讲究平行对偶。另外，它还规定句子有字数的限制，一般是四字句和六字句（故骈文后又被称为“四六”文）；要求字句音韵协调，平仄相对；讲究用典和词藻的华丽。骈文形式上的这些格律要求，起先是为了加强文章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整齐匀称的美感，使语言富于音乐性，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并使文字色彩鲜艳秾丽。这体现了散文摆脱经子附庸地位，争取具有更为鲜明的审美特征和文学色彩的历史趋势。事实

上一些优秀的骈文，除了思想内容可取外，也确实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和美感作用。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写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又如邱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写景生动，音节和谐，文字优美，有较强的表现力和审美趣味。骈文对律诗和散文文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并为增强散文的文学特性和艺术美起了积极作用。所以，骈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作出过独有的贡献，不能完全否定。但是骈文有着先天性的致命弊病，就是它过分注重形式美，而忽略文章的思想内容。发展到后来，原本为提高艺术效果所规定的一些格律限制，反而成了表达内容、增强表现力的束缚。越来越繁琐的格律要求，不仅使文章平板滞涩，重复拖沓，而且难以自由书写；用典过多，容易有掉书袋的毛病，使人感到晦涩难懂；过分追求词藻的华丽，造成了文风的纤巧萎靡和语言的脱离生活实际，它完全成了一种高度贵族化的文体。而许多骈文的内容则十分空虚贫乏，主要是反映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士腐朽糜烂的生活和空虚颓唐的精神状态。从南北朝到唐中叶的长时期内，不仅文学性的散文，而且连书札、奏议等应用文也使用这种文体。这种骈文垄断一切散文领域的状况，严重地阻碍了我国散文的健康发展。因此，从骈体文的鼎盛时期开始，就不断有人反对这种文体，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时流行的奇句单行，长短参差，自由书写的散文文。发生在唐中叶贞元、元和之间的古文运动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相当长的酝酿准备时期。

早在北朝的西魏，就出现了反对骈文浮艳文风，提倡写作古文的尝试。苏绰仿照《尚书》的文体写了一篇皇帝祭庙用的《大诰》，以后朝廷就规定文笔都依这种格式写。但《尚书》体诘屈

聱牙，古奥难懂，离开口头语言更远，结果变革并没有成功。到了隋朝，隋文帝企图以行政手段来消除华艳的文风，于公元584年下令，一切公私文字都要实录，不许用浮华的词句来写。当时有个官吏李谔，也上书给隋文帝，对绮靡文风作了猛烈抨击，并主张进一步通过政府命令来加以改革。由于他们只是否定华艳的文风，没有触及骈体文这一产生华艳文风的根源，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收效并不大。但以上这两次改革的尝试，毕竟是对华艳文风的最初冲击。

到了初唐，一方面六朝以来的绮靡文风的影响还很大，另一方面已出现了反对这种不良文风，要求复兴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强烈呼声，初唐“四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杨炯曾批评当时的文章“骨气都尽，刚健不闻”^①，对这种雕琢纤弱的弊病表示不满。王勃也慨叹“天下之文，靡不坏矣”^②，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他们不想在革新文体的前提下消除文弊，有时甚至还沉溺于绮艳的时风中，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改革文风的彻底性。稍后的刘知几，则进一步对骈文文体本身加以批判：“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虚引古事，妄足庸音，苟矜其学，必辩而非当”，“虚加练饰，轻事雕彩”^③，尖锐地揭示骈文一味骈偶、重复拖沓、滥用典故、卖弄学问、堆砌词藻、雕琢浮华等弊病，可谓一针见血。但他对文章的文采等艺术技巧有所忽视，亦有一定的片面性。到了陈子昂时，情况有了更为明显的变化。陈子昂是初唐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他更多的注意力是在诗歌革新方面，没有单独发表什么古文主张，但是他提出“风雅”、“兴

①《王勃集序》。

②《王子安集·上吏部裴侍郎启》。

③《史通·叙事》。

寄”和“汉魏风骨”，强调文学要有充实的社会内容和刚健清新的风格，也包含着对散文的革新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在散文创作实践中，写出了疏朴明白的古文，使当时的文风为之一变。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①。”陈子昂是唐代古文运动最早的先驱者。

进入盛唐、中唐后，上继陈子昂，经古文家萧颖士、李华、独孤及、元结、梁肃、柳冕等人的努力，在奠定古文运动理论基础和古文写作实践两方面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首先，他们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风进行了抨击。如独孤及尖锐地批判当时骈文忽视内容，片面讲究词藻格律的绮靡文风：“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俚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八病四声为楷拳，拳拳守之如奉法令”^②。第二，在内容上进一步以儒家经典为榜样，提出文章要宣扬儒家思想，发挥社会教化作用。萧颖士说他自己“经术之外，略不婴心”^③，柳冕认为“文章本于教化”^④。第三，在文体的改革上，提倡写作古文，用以代替骈文。他们在写作实践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萧颖士诸人都已变骈偶为散体，写了不少古文，但成就不大。其中取得较高成绩的是元结，他的愤世嫉俗的政论文和清新秀逸的山水园亭游记都写得很好，“唐文不待昌黎变之，元结已变之”^⑤，元结的散文创作，是后来韩、柳古文的先声。不过，总的讲，这些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理论上过分强调尊崇儒家经典，道学气很重，对文章的艺术性有所忽视；写作实践上还没有完全摆脱骈俪

①《荐士诗》。

②《毗陵集·赵郡李公中集序》。

③《赠韦司业书》。

④《与徐给事论文书》。

⑤王文禄：《文脉·杂论》。

习气，才能又不高，创作收获并不大，所以当时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声势的散文革新运动，也只是为后来的古文运动作了酝酿准备。

到中唐贞元、元和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更趋激化：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佛道盛行，阶级对立尖锐，回纥、吐蕃的贵族不断入侵，这种内忧外患交困的状况，严重地威胁着李唐王朝的统治。于是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敏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为了挽救唐朝政府的崩溃、巩固封建统治，大力宣扬儒家思想，竭力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并针砭时弊，进行政治改革，企图实行儒家的清明政治。而六朝以来文风浮华、形式僵化的骈文已经成了自由表达思想、进行舆论宣传的桎梏，不能适用于进行这种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奇句单行、书写灵活的古文，才能成为传播儒家思想和宣传政治革新主张得心应手的工具。于是和儒家复古运动与政治改革斗争相联系，以革新散文为目标的古文运动就在这时蓬勃开展起来。这场运动有韩愈、柳宗元这样杰出的古文家的倡导，他们总结并吸取了古文运动先驱者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古文理论，用来指导古文运动的开展，并把理论付之实践，在先秦两汉散体文的基础上，借鉴六朝文中的有益成分，吸收当时语言中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创造了“古文”这种新文体，卓然有所树立，加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一大批古文家同声相求，推波助澜，终于使这场散文革新运动取得了胜利。

在古文运动中，韩愈凭借他的崇高声誉和卓越才华，大声疾呼，努力提倡，“古文”这一名称就最早见于他的文章中（如《题欧阳生哀辞后》、《与冯宿论文书》等）。他阐发了一系列散文革新主张，提出了对“古文”的具体要求，并亲自摸索、实践，创作出大量雄奇奔放、明晓流畅、富有新鲜感和表现力的散文作品，成为“古文”的出色范例。他还广交文友，培养许多韩门

弟子，扩大了运动的声势和影响。韩愈在散文革新上确实立下了“摧陷廓清之功”^①，起到了古文运动主要领导者的出色作用。

柳宗元也是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原先主要是用骈体文进行写作的，被贬永州以后，由于政治地位发生变化，有机会较深入地接触社会实际，从事政治改革的宣传及其它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并广泛涉猎前人创作成果，引起了对自己过去写作经历的反思和总结，触发了文学思想的变化，使他越来越感到骈俪的文章体制和绮靡的文风非改革不可，于是也一变而为写作朴实顺畅的古文。“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②，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文章内容上有变化，而且也包括文章体制上由主要写骈文而改为基本上用“古文”来写作。当时南方有许多士子来向他求师，跟从他学习写作，还有各地不少青年写信给他，向他讨教创作问题，他都悉心加以指导。“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③。这时期他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复杜温夫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等许多著名论文书信。在口授和通信中，他竭力提倡古文，反对“骈四俪六，锦心绣口”^④的骈体文，支持和赞扬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作法和创作实践，并提出许多改革散文的理论主张，大大扩大了古文运动的影响。加上柳宗元本人大量优秀古文创作所起的示范作用，更有力地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他对当时的文章体制、风尚和语言的改革，特别是在增强散文的文学特

①李汉：《韩昌黎集序》

②《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③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④《乞巧文》。

性和美感作用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

柳宗元具有比较系统的文学观点，这是他整个进步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他倡导古文运动和进行散文创作的理论指导。柳宗元之所以不仅成为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在倡导古文运动和散文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显然和这点是分不开的。他的这些文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即使今天看来，有些地方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文”与“道”，亦即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柳宗元强调“文”、“道”结合，提倡“文以明道”。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明确提出：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又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他认为作文是为了阐明“道”，表达作者的思想。这个“文以明道”的主张并不是柳宗元的创造发明，但是他所说的“道”、“文”以及对“道”与“文”关系的理解，具有新的、更明确的内涵，打上了他所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鲜明印记，是对传统文道

观的发展。

早在南北朝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就提出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观点。以后隋代的王通在《中说·天地篇》中也说：“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进入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亦提倡“宗经”、“明道”的主张，如梁肃强调“文本于道^①”，柳冕指出：“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②。”这些说法，和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十分类似。但是，他们所说的“道”，主要是儒家思想，是偏于书本上的儒家教条。到了韩愈时，他更明确地提出“修其辞以明其道”^③。柳宗元“文以明道”的观点和韩愈的主张是相一致的，这是他们一起倡导古文运动的共同思想基础之一。不过，韩愈强调所明的“道”仍是儒家之道，尽管他的思想对儒家之道有所突破，以至于被《旧唐书·韩愈传》说成“亦有戾孔孟之旨”，但就其道的主要方面看，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且更偏重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封建等级思想，有较多的落后性，所以他的那些载道的文章并不是他散文中的优秀部分，反倒是那部分对儒家道统有所突破，特别是自鸣不平的文章闪烁着更多的思想光彩。柳宗元所要明的“道”，比较复杂，有着汇合各家之说的特点，包含着佛家思想的因素，但主要部分也还是儒家之道，这一点同他以前的文论家以及韩愈既有相通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这不同的地方首先表现在他往往把儒家之道说成就是“大中”、“大中之道”，强调“中”、“当”，肯定一切事物要顺乎时代变化趋势，符合内在发展规

①《补阙李君前集序》。

②《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③《争臣论》。

律，做到适宜恰切。当古代的“道”和现实中的“当”发生矛盾时，他宁愿改变对古已有之的“道”的认识，对传统的“道”作出新的解释，以切合“当”，达到“中”。所以他和那些死抱住儒家教条不放的“拘儒”不一样，他所倡言的儒家之道比较通脱灵活，带有鲜明的反传统反潮流的色彩。其次表现在他还强调“以辅时及物为道”，“施于事，及于物^①”，也就是主张“道”要有益时政，惠及万物，能发挥实际的社会作用，所以他又和那些坐而论道、空谈性命的“腐儒”不一样，他所提倡的“圣人之道”比较合理实用，带有明显的现实精神。正由于此，柳宗元主张文章要阐明的道，要表达的内容，不仅有十分明确的规定性，而且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表现出浓厚的革新精神和现实性。柳宗元的散文卓越地实践了自己这方面的主张，所以他文章的内容不仅丰富、扎实，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浓重的时代气息，而且观点往往非常精辟卓绝，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不道，振聋发聩，新人耳目。

柳宗元所说的“文”也有创新之处。刘勰提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虽然也有批判形式主义文风的作用，但对“文”的体制的改革没有提出要求。唐代古文运动先驱者们强调“宗经”、“明道”时，是提倡写作古文的，可是他们并无改革文体的具体主张，在写作实践上也是明而未融，缺乏特色，成就不高。作为唐代古文运动主将的韩愈，在文体改革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不同于骈文的奇句单行，自由书写的散文来“明道”，并对文体改革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他强调“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②。”力主文章在形式上应该气势充沛、自

①《送徐从事北游序》。

②《答李翱书》。

由活泼，句子可以长短参差，声调可以高低抑扬，不象骈文那样要受对偶、字数以及音律上的限制，这就使文章具有更大的自然生动性和表现力。他提倡“文从字顺各识职^①”，即文句要符合语法规律和语言的自然气势，使文章更接近当时的口语，更加平易通顺，妥帖流畅。他还提出“唯陈言之务去^②”的口号，既要摒弃陈词滥调，也要在文章体制上革新。韩愈把这些理论付之实践，确立了新型散文——古文的统治地位，从而使散文能更好地发挥“明道”的作用。

柳宗元对“文”的要求和韩愈是相一致的。他早年虽然爱用骈文写作，但被贬永州以后，思想和写作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此后，他开始旗帜鲜明地批判浮艳绮靡的形式主义文风。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针砭“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的文弊，在《乞巧文》中更对当时的“文巧”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哢哢飞走。骈四俚六，锦心绣口。官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无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

柳宗元通过这些生动的比喻和描写，把华而不实、夸饰伪巧的文章弊病揭露得淋漓尽致。更为可贵的是，他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批判是同骈文的体制联系起来的，揭示了浮靡文风是骈文的必然产物，并且由于他本人是写作骈文的过来人，对这种文体的弊病感受得切，认识得深，因此所发议论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如“骈固

①《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②《答李翱书》。

俚六，锦心绣口”等语已经成为形容骈文特征及其弊病的习惯成语了。这些，对旧文体的“破”产生了重大作用。

另一方面，他大力肯定韩愈所写的古文，并和韩愈一样，也提出了文体改革方面的主张。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

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

柳宗元在这里强调文章运用虚词要“当律令”，即要符合语法规律，并指出“乎”、“欤”、“耶”、“哉”、“夫”属于疑问语气词，“矣”、“耳”、“焉”、“也”属于判断语气词，这些不同类型的虚词不能混用。多用虚词是散文和骈文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柳宗元主张正确运用虚词，并且他自己所作文就是虚词“当律令”的典范，正是他提倡奇句单行、错综参差的古文，强调古文规范化的表现，这对新文体的“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还肯定《列子》“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①”，赞扬柳浑“凡为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②”，表明他反对刻意雕饰，主张文章自然质朴、深切醇厚；不满意固定程式，提倡作文自由活泼，挥洒不羁。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唐代古文运动中提出的古文理论，为完善古文的体制作出了贡献。

柳宗元“文以明道”的主张，在对“文”和“道”的关系的认识上也十分明确，包含有朴素的辩证因素。“文以明道”，就

①《辩列子》

②《柳常侍行状》

是说写文章是为了阐明道。“道”和“文”这二者，“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决定性的东西，“文”要服从于“道”，内容是主要的，形式要为内容服务。因此，他反对文章忽视内容、片面追求形式主义文风的倾向。柳宗元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如《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说：

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译以为工，遁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

《与杨海之第二书》说：

……好事者藻溃文字，以矜世取誉，圣人不足重也。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也说：

“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

他认为一味雕饰，单纯追求形式技巧，去表现那些空洞、腐朽、违背真实的内容，是极端错误的，就像用美丽的锦缎去覆盖陷阱一样，将贻害无穷。他大声疾呼“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这种和重文轻道的形式主义倾向坚决斗争的态度，使他在端正文风的散文革新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

“文以明道”，意味着“道”要靠“文”来阐明，内容要由

形式来表达，“道”和“文”互相依靠，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文”有相对的独立性，形式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柳宗元对此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加以强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说：

言而无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

《杨评事文集后序》说：

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

《〈非国语〉后记》说：

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

在这些地方，都指出了形式是表达内容的手段，文采是文章更好地表达内容不可或缺的条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柳宗元所说的“文”，即形式技巧，不仅指语言文字，而且还包括要能“感激愤悱”^①，要做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②；也就是说文章要有较强的抒情性和形象性，成为抒发感情和描摹事物得心应手的工具，突出了散文的文学性能和美感作用。柳宗元这种对“道”和“文”关系全面、辩证的看法，既鲜明地否定了骈文片面讲究形式忽视内容的浮艳文风，又与韩、柳以前古文运动先驱者忽略古文艺术性的理论划清了界线。同韩愈的主张相比，他在文道结

①《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

②《愚溪诗序》。